

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体育的发展

——基于山东省村改居地区的调查与分析

赵述强¹, 刘年伟²

(1. 山东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2. 闽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在顶层设计、区域变迁、空间变革、人群结构变化的影响下, 村改居社区体育迎来发展新契机, 但实践中依然存在居民健身意识与行为不匹配, 差异化明显, 居民健身效果不理想, 主动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等问题。归结其原因, 主要与基层治理主体重组、社区空间变革、网络关系复杂化、居民认同危机、体育自营能力不足、网络负效应增强等因素有关。建议: 厘清治理边界, 推进村改居社区体育网格化治理; 激发居民体育潜意识, 扭转居民传统体育认知; 促使村改居社区居民身份认同, 实现社区体育供需分层; 深挖地区资源, 谋划社区体育自营发展格局; 鼓励社区体育与社会力量接轨, 共创社区体育新局面。

关键词: 社区体育; 体育健身; 城镇化; 村改居; 山东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0)04-0078-06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remodeled residence community s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remodeled residence areas in Shandong

ZHAO Shu-qiang¹, LIU Nian-wei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p-level design depth, region transformation, space reform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ing, village remodeled residence community sports have ushered in a new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but in practice, they still have problems such as residents' fitness awareness not matching with their behaviors, differentiation being obvious, resident fitness effect being not ideal,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ctive demand and supply being prominent, etc. The cause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mainly related to such factors as grassroots governance subject re-grouping, community space reform, network relationship complication, resident recognition crisis, inadequate sports self-running ability, increasing network negative effect, etc. Suggestions: clarify governance boundaries, boost village remodeled residence community sports gridding governance; stimulate residents' sports sub-consciousness, change residents' traditional sports cognition; establish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residents in village remodeled residence communities, realize community sports supply and demand hierarchy; dig deep to find regional resources, plan community sports self-running development structure; encourage community sports connection to social forces,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jointly.

Key words: community sports; sports fitness; urbanization; village remodeled residence; Shandong

收稿日期: 2019-09-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YJC89004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9DTYJ02); 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DSKL140420)。

作者简介: 赵述强(1988-), 男,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E-mail: zsqdty@126.com

近2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国家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下位于城市边缘的大量城中村进行改造,或就地改建,或搬迁新建。同时受城镇化双轨制影响,城市边缘地带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劳动人口的聚集中不断外扩,郊区农村逐渐以工业园区、城市新区等形式被规划到城市范畴中,在此影响下村改居社区开始广泛涌现^[1]。由于多数村改居社区地处城乡交接带,居民生活、交往及生产等空间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而社区中人口流动、身份变动等问题也对社区体育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在国家全民健身、大众体育均等化的要求下,广大城市社区体育服务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在农村地区依然面临诸如场地设施不足、居民健身意识薄弱、参与度低等问题。在村改居过程中社区体育发展产生了哪些变化?新的基层治理对社区体育产生怎样的影响?都值得深思。本研究于2018年6月—2019年6月,采取访谈与问卷形式对山东济南、青岛、潍坊、德州、烟台、济宁等地村改居社区居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状况、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等进行调查,分析现实状况,探讨发展机遇、困境及策略,为村改居社区体育发展提供参考。

1 村改居社区体育的现状

1.1 社区居民健身意识与行为差异

近年来,在我国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组织及居民共同努力下,注重公平、高效的群众体育政策方针盘活了一些村改居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低迷状态,但相比于城镇社区,居民在健身意识及行为上还处于比较落后。调查发现:(1)尽管在全民健身大环境影响下,居民健身意识有所提高,但因年龄、个人兴趣、外界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居民实际参与率较低;(2)青少年和中年群体虽健身意愿高,但因学业、工作、家庭、自媒体及网络游戏等因素影响,参与率极低;而中老年人和群体健身数量增加,但分化明显,除少数中老年居民参与广场舞、太极拳、健身走、棋牌等活动,更多居民则主要从事看孩子、拉家常等为主的活动。由于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村改居社区居民健身活动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未来需转变思想,提高社区居民体育意识,积极培育体育骨干,形成以点带面的社区体育创新发展模式,从而实现社区居民体育健身的生活化与常态化。

1.2 社区居民体育健身效果不理想

相对于社区居民参与度而言,居民健身效果更易于准确评价与衡量居民健身质量。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民健身参与度明显提高,但握力、背力等肌肉力量

却呈下降趋势,达标率相比于过去5年下降0.1%^[2],表明居民整体健身质量并没有在广泛参与中得到显著提高。调查发现:年轻群体倾向于与家人、朋友一起参与球类、健身健美、慢跑等中等强度的运动项目,但受无时间、个人惰性、缺少场地设施、无同伴等影响,表现出健身时间短、次数少、频率不固定等特点;而中年以上人群,以个人或自发结伴为主,多从事于广场舞、太极拳、棋牌、慢走等有氧活动,但受无兴趣、意识低、缺少技能、含蓄心理等影响,健身时间、次数整体差异大,健身的随意性明显。另外,居民健身因季节变化影响较大,尤其在冬季,缺乏室内场地,社区体育几乎停滞。由此,尽管居民健身意愿与参与度有所提升,但居民健身效果并不理想,而增加体育元素植入、搞活社区体育竞赛、营造社区体育氛围、形成一地一品或多品的社区体育新时尚将是未来社区体育建设的主攻方向。

1.3 社区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矛盾

在村改居社区中,经济、文化及人口结构的城市化,让一部分居民逐渐对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活动、信息等社区体育服务提出更高要求,而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成为引领社区体育建设的风向标。调查发现:在社区健身组织层面,受社区经费、专业人员匮乏等影响,仅少数社区存在诸如健身俱乐部、健身居民委员会等体育组织,更多健身活动靠居民自发组织。健身设施与场地因社区经费、空间狭小等因素使供给结构单一、供需不一、不均衡矛盾突出,居民渴望增加的球类等健身设施得不到解决。在健身指导层面,社区居民更希望增加专业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以便在广场舞、太极拳等技术方面提供指导。实践中,由于缺乏岗位、待遇低,体育指导员几乎难以招聘,居民仅靠自身了解及网络视频学习等手段进行健身活动。综上表明,在村改居社区中,体育服务并未因空间的变迁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居民公共体育需求与供给不充分的矛盾长期存在,而健全社区体育组织,合理统筹与规划社区体育资源,形成具有特色的社区体育新格局迫在眉睫。

2 村改居社区体育发展机遇

2.1 顶层设计纵深构筑社区体育新保障

自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重心开始由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为主的体育产业协同化发展转移,社区体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3]。近些年,为促进城乡地区体育的快速发展,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下,一些有关城乡社区体育政策接踵而至,如2016年6月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明确指出“推

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向农村延伸,以乡镇、农村社区为重点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4]2017年12月农业部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民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将农民体育事业作为全民健身的重点任务,着力补齐农村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保障居民体育健身运动的开展。”^[5]201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直接将“鞭策根基大众体育办事在地域、城乡、行业和人群间的均等化,促进资源向农村倾斜,重点扶持贫困地域”纳入到新时期国家体育战略之中^[6]。目前,虽然村改居在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渡中生存属性发生了变化,但从实践中看,社区体育依然保留了大量原有农村体育的发展特征,而这些利好政策的相继实施无疑为这些地区体育建设的探索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2.2 区域变迁孕育社区体育成长新动能

与传统的旧城改造相比,村改居进程中的就地或异地安置都将伴随着居民地域、经济结构、户籍及土地要素上的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对社区体育成长也同样孕育了新动能。一方面,政府在一些村改居项目中实施住房的置换政策及城乡二元体制破除极大缓解居民住房、养老、看病带来的经济压力,从而有助于居民在社区体育健身中不断增加精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在刺激居民体育消费的同时带动了市场中体育产业的增量;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与征用迫使更多居民转入企业型的工作岗位,享受“朝九晚五”及法定休假的待遇,余暇时间的增多让一些社区居民开始考虑参与到社区体育活动中来。此外,随着地域的变迁,社区及周边的环境也发生较大变化,社区中的体育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周边的健身广场、健身中心随之兴起,而一些靠近学校、公园等地区的居民更是较早的投入到了体育健身中。尽管当下村改居社区还仅处在过渡期,但在城乡边界逐渐消除,区域变迁所带来的实际效益确实对社区体育产生了积极作用。

2.3 空间变革为社区体育发展提供新空间

在我国,村改居策略是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政府对城市规划下空间资源使用和收益的分配和协调,体现政府、市场及居民多种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互动博弈^[7]。在此过程中,居民所拥有生存、生产及交往空间正在悄然改变,而社区体育场所作为居民基层公共生活领域,同时也是个人健身活动主要场所,新社区的空间变革同样为其带来新的生机。与传统村落相比,村改居社区空间布局的改变,让社区组织和功能也发生了适应性转变,社区治理服务站的出现,大大改善社区体育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让社区体育在基层中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进入到居

民视线中。此外,社区的集中安置也将解决因空间布局存在的跨度大、管理难、信息不畅等问题,而社区及多社区居民的集中参与及资源共享也可缓解村落中体育场地设施闲置、资源利用率低及分布不均等现象。在走访山东烟台最大村改居海韵社区发现,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不同资源整合实现了居民参与、体育指导、健身设施、竞赛活动、体育信息平台、视频监控等社区体育服务一体化,有效缓解了社区体育服务供给不足、监管不力的现象。因此,村改居社区在由分散型向密集型空间的过渡中,尽管伴随一些传统乡村公共空间的消失,但在统一规划下,社区体育却得到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2.4 人群结构变化带动社区体育健身热潮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村改居成为众多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居民传统体育思想与惯习遗留下的桎梏得到了一定程度消解,社区中不同职业、文化、民族等居民的融入打破了社区原本封闭与熟悉存在模式,扭转了一些居民对于健身尴尬、含蓄、羞涩及弱化的本位思想,有利于居民健身意识的形成。另外,在全民健身的带动下,社区中新老居民精神文化与健身休闲需要也随之提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改居社区中,涌现出了诸多不同文化、民族、职业背景下的太极拳、武术、棋牌、广场舞、球类等民间体育社团组织,社区多种体育活动得到有序开展,居民健身热情持续走高。此外,随着社会创新型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主的智能化体育产品与服务应用将打破原有社区体育发展格局,而人口结构变化可以让其更快的融入到社区,服务于居民科学健身。

3 村改居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基层治理主体重组,社区体育依旧被边缘化

在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虽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社区类型而存在,但在短暂过渡期中社区在组织与制度层面已开启了由农村向城镇社区的变迁,而结构与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然而,在基层治理组织实现重组的过程中,尽管社区服务站、村民小组及居民社团组织将体育活动纳入到日常工作之中,但在地区经济、地域交错、人口关系复杂等因素干预下,居委会尚不能充分发挥治理作用,更多的是放之任之,社区体育依旧处于边缘化,如在村改居社区中,长期存在健身器材无人监管,居委会无专门维修资金进行养护,许多器械“旧修不愈”无法被充分利用的现象。此外,随着市场的发育,国家倡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已在不同城市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中铺开、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9]。但村改居社区多地处城市

边缘地带,短期的发展水平还远落后于城中心,现有的行业协会、体育企业、社区体育指导等社会力量的生存空间及辐射力度有限,难以实现全覆盖,而政府的简政放权所产生的治理职能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社区体育治理的尴尬局面,导致一些社区体育资源长期处于供给不足、分配不均衡状态。因此,多主体参与治理的模式从长远看固然利于社区体育发展,但眼下针对村改居社区复杂情形,社区体育的治理依然需要秉承政府主抓,社会体育组织、基层社区居委会、物业及居民间协同的治理模式。

3.2 社区生活空间化延迟居民健身惯习的形成

后奥运时期,以实现“体育强国梦”为指导战略思想大大提高群众体育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社区体育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机遇,更多边缘贫困社区因在国家“健康中国”“雪炭工程”“体育建设工程”等措施的资助后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居民健身意识的萌生,带动了以自发性组织的广场舞、太极拳等集体性健身活动广泛兴起。在村改居社区中,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城市扩张,农民上楼都体现着被动城市化的关系,村民的角色转换要明显滞后于物质变迁,而新社区中基础医疗、教育、治安等都需要重新布局,社区体育健身极易在与这些因素的比拼中被居民所遗忘,“社区中政治、经济及环境可以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但居民文化结构却需要数十年的时间”^[10]。此外,村改居社区中高密度的立体单元式居住空间替代半开、半闭合的平面式院落,高层居住所产生的垂直与封闭性阻碍了乡村住宅中串门走巷、三五结伴拉家常、遛弯、打牌、纳凉等交往活动,让原本受传统思想束缚、对健身概念模糊、长期存在“干活等同于锻炼”的居民更难形成健身惯习。因此,如何让村改居居民在空间转换中更快地适应新社区环境,提高居民健身意识、增强居民参与主动性或许远比植入更多的健身器材显得更加紧迫。

3.3 社区关系网络复杂化,居民认同危机加剧

村改居是国家主导下城市扩张、新城开发及土地流转中实行的单一或多村集中安置下的产物。社区中不同村庄人口的迁住让原有传统社区逐渐消解为多个局部“熟人社会”的异质性区域,而由于该地区居民生活成本较低,众多外籍人口的涌入也使得原有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传统家族的人际关系格局逐渐松动瓦解,社区关系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化^[11]。对于原居民而言,外来人口侵占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基础设施、福利等资源,打破原有生活习惯带来排斥感;而对于外来人口,因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均等化的服务、社区事务参与、利益诉求等方面难以得到一致性保障,

同样存在心理的不平衡。这种非定居性移民因其所属社会和利益关系在移民社区的双重缺失与空间错位引发的社区认同危机,导致他们难以真正的融入到社区中来。如今,这种社区关系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对村改居社区体育的阻碍也颇明显,在居民参与活动的认同危机中陌生、反感等因素直接加重了居民因相关体育技能的缺失所产生的“羞愧”“不敢尝试”的心理危机,影响了主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间接造成更多体育设施的闲置与浪费。在社区体育监管中,认同危机加重社区居民事不关己、视而不见的心态,降低对社区体育设施监管责任感。在体育需求反馈中,认同危机让更多的居民在共享体育服务的需求反馈中沉默不语,被动接受加剧政府在普及社区体育建设中的困难,同时也丧失主动争取福利的权利。由此,未来如何建设良好社区关系,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将成为社区体育建设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3.4 社区传统公共空间有限,体育自营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领导下,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治理体系,原有的县、乡等地区的自治模式逐渐松动,更多的新兴力量使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更减小了原有生存空间,多元化的开放性治理格局逐渐形成。在村改居社区,城市化让居民原有的大院、街巷被紧密的居民楼挤占,大量体现生态价值的绿地景观开始占据原来乡村落中人们活动的场所,居民的活动更多集中在楼下、路边等空地。另外,居民熟悉的球类、棋牌、广场舞等社区体育场所被固定的健身器械所代替,尽管这些或许更有利于居民从事体育健身,但在传统居民思想里,这些新兴的健身器材在适应性、娱乐性上却不易被接受,参与程度较低。随着经济发展,地区商业化也愈发明显,社区中更多的钱、财、物开始统归于政府管辖,社区失去了自收自支的权利,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体育的自营能力,而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组织者与管理者,还难以组织有规模、有质量的社区体育活动,长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进一步导致社区体育建设的被动。

3.5 居民网络负效应增强,社区体育弱化

21世纪后,多种信息的交互、集合与转换让互联网发展进入新时代,新媒体直播、QQ、微信社交软件等互联网成果已经吸引了数以万计居民。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微信、微博、抖音等移动社交视频用户约7亿人,移动网络游戏用户数约5.21亿,电脑网络游戏用户数约4.84亿^[12],显然虚拟网络与自媒体的兴起正在改变着社区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村改居社区中,居民处于短期时空转换中所产生认同滞后、

私人空间封闭、公共空间陌生、传统公共交流网络消亡等因素都加重了居民对虚拟网络与自媒体的依赖,成为制约居民从事社区体育活动的重要原因,或者说网络的负效应让更多居民在参与体育健身与安于传统生活现状的博弈中直接选择后者。因此,互联网的兴起,在居民受益的同时也对村改居社区体育的快速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而如何扬长避短,用好互联网发展成果成为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4 村改居社区体育发展的策略

4.1 推进村改居社区体育的网格化治理

当前,国家在对社区体育服务的监管上颁布的具有力度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重服务、轻监督、轻反馈”的现象,显然在村改居社区体育的发展中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更加精细的基层治理方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行社区网格服务管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如今,在实践中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众多社区的共同选择,相对于普遍实行的城市社区,局部的网格化治理似乎更好地迎合了村改居的空间特点与治理需要。一方面,村改居社区的形成打破了原来村落的社区治理结构,新区域下治理存在着权责不清、监管不明的现象,而网格化模式将社区切割成片,以单元管理有助于治理权限与边界的清晰及新社区秩序的快速形成;另一方面,在诸多村改居社区中依然保留了原有的村级基层治理模式,而村级组织中的党组织、党员、村积极分子等群体可以迅速实现与空间、单元网格的一一对应,将体育治理的责任准确地落实到个人,实现党组织全面领导下的群众自治、区域共治、厉行法治与崇尚德治的治理体系。此外,在村改居的变迁中,物业公司作为监管的第三方也将作为治理主体进驻到社区中来,它的监管将一定程度上避免原有村落中的“小圈子社会”存在熟人面子、关系现象,通过监控、通报、披露等方式,充分发挥监管-反馈-惩治的治理效果,真正做到体育场地设施谁使用谁负责、谁破坏谁赔偿。

4.2 激活居民健身意识,改变居民传统体育认知

一直以来,受国内大环境影响,社区体育不受重视,居民对于社区体育的益处不以为然,而在村改居社区中,居民在空间变革与结构重组影响下,原本薄弱的健身意识更加容易被遗忘。此外,相较于外来居民,一些原来居民对体育的概念及功能意义认识尚不清晰,易将“体育健身”理解成“体力活动”,忽视体育健身在促进自身机能及慢性疾病防治中的价值,如一些居民认为日常的劳动便是健身,没必要花时间和

精力再参加体育活动。因此,要想发展社区体育,须激活居民健身意识,改变居民对体育的认知,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重新审视体育健身活动的价值。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增强体育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力。严格贯彻国家关于加强社区体育建设的相关要求,理顺辖区政府体育执政权利关系,设立问责机制,尤其是要将社区体育纳入社区干部的绩效考核中,实行层层责任制,确保国家体育政策的顺利实施;第二,选派相关体育干部定期深入基层社区,带头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开展体育知识讲座宣传社区体育活动益处,指导居民体育健身器材的使用方法,不断提高居民体育意识。此外,培养社区体育标兵,如太极拳、广场舞体育能手,实现社区体育活动的“传、帮、带”,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在体育技能的传递中走出家门,感受体育健身的好处。

4.3 提高居民身份认同,实现社区体育供需分层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村改居社区中的多村合并让不同村落居民汇集一起,虽保留了原有“局部亲属”“邻里关系”及“各村自治”,但居民因生活习惯、文化、职业、教育背景等因素产生的异质性要远比以往大得多,居民因身份认同与集体观念所引发对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开发、占有与使用等方面的冲突也日趋严重。因此,在有限的空间与资源下,如何营造居民的身份认同,建立社区发展新秩序将是推动社区体育不断发展的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要全面考量居民需求,通过已经建成或将要建设的各类公共空间及资源来实现社区认同感,如构建社区体育健身中心及老年活动中心,实现居民体育健身的分层,缓解地区器材闲置、人满为患现象;而社区体育社团的组建也可发挥自上而下作用,通过开展各类活动来树立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存在感。在村改居中,传统的公共空间正在消失,但村庄活动和参与者依然存在,基层体育组织的设立将“地方性知识”融入,让传统和集体记忆得以保留,便于营造出新的社区共同体。此外,政府、社会组织要深入社区开展调查,改变在供给中盲目性、一刀切的做法,居委会作为社区体育服务建设代行者与监管者,要协调好辖区上级政府、物业及社会相关组织,及时反馈居民的体育需要,妥善有效地解决社区居民的实际问题,进而实现体育资源优化配置。

4.4 深挖社区优势资源,谋划社区体育自营发展格局

过去的实践证明:政府单一的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对于体育的需求,而多元化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虽然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但不足以对发展薄弱的村改居社区体育产生质的改变,居民体育

供需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13]。因此,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在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迫切需要探索适合自身体育发展的新模式。首先,结合自身地区优势,形成自营的供给模式,如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社区可以通过创收自行购置运动器材,采取与企业进行置换或通过广告、土地使用等形式吸引体育赞助商进行投入。其次,整合地域资源,开辟健身环境,如利用社区闲置土地修建简单的体育场所,供居民使用;一些背靠风景区的社区将旅游与休闲体育相结合,发展徒步、登山、钓鱼、游泳等户外体育健身运动;将地区风俗节日与体育活动联结,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活动等。再次,建立社区居民体育竞赛机制。根据居民个体情况、时节气候及项目要求,全年组织社区或跨社区间的体育竞赛,如棋牌、广场舞、太极拳、球类等,在营造健身氛围的同时有效缓解单一社区资金匮乏、场地设施不足等状况。如今,社区体育自营作为诸多社区推行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强化社区自治的重要体现,对于调节居民关系,形成长期稳定的社区体育文化,实现社区健康发展的美好愿景意义重大。

4.5 鼓励社会力量进社区,共创和谐社区体育新局面

在国家“体育十三五”时期,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引领,鼓励政府主导下的多种社会力量参与,不断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成为了社区体育发展的新路径^[14]。现阶段,国家在城乡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普及已初具规模,但在村改居社区体育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还远不及城市社区,依然处在较低水平。对于村改居社区而言,携手社会力量更有助于拓宽社区体育发展渠道,缓解整体资源不足的局面,对激活社区体育氛围,共创社区体育新局面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政府、协会及其他体育组织进社区的社区志愿活动,修缮社区体育基础设施,提升体育基础软实力,如山东省体育局发起“四进”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让更多的体育技能流入社区,居民在体育健身的技术指导与体验中获益良多;另一方面,在地区政府的协助下,积极与地方体育企业、俱乐部、高校等单位合作交流,构建社区体育示范区、社区实习基地,推进相关单位向社区提供基础设施、健身指导、健身知识等体育服务。此外,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投资与合作,共同开发体育健身旅游资源。比如青岛即墨区体育特色小镇,通过当地政府、体育旅游公司及鳌山卫、温泉等多个地域的村改居社区联合开发的自行车、马术,户外和高空活动以及海洋体育旅游为一体的大众休闲体育场所,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在实现体育产业增创收的同时有

效激活了社区体育的发展。因此,在村改居社区未来体育发展中,亟需在市场环境下与社会力量的结合,不断转换思路,开辟出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吴莹. 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7(6): 100-122+250.
- [2]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解读[EB/OL]. (2015-12-01) [2019-08-02]. <http://www.sport.gov.cn/n317/n349/c222917/content.html>.
- [3] 刘国永. 对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的若干思考[J]. 体育科学, 2018, 36(1): 4-8.
- [4]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EB/OL]. (2016-06-23) [2019-08-0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23/content_5084564.htm.
- [5] 农业部,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 (2017-12-28) [2019-08-02]. 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tz/201712/t20171228_5991121.htm.
- [6]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 (2019-09-02) [2019-09-08].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utm_source=UfqNews.
- [7] 张京祥,陈浩. 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J]. 城市规划, 2014, 38(11): 9-15.
- [8] 杨贵华. 转型与创生“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59.
- [9] 唐刚,彭英. 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J]. 体育科学, 2016, 36(3): 10-24.
- [10] 陈映芳.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J]. 社会科学, 2012(10): 70-76.
- [11] 黄成亮.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J]. 中州学刊, 2019(2): 80-85.
- [12] 速途研究院. 2018年中国移动社交行业研究报告[EB/OL]. (2019-04-16) [2019-08-02].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hk/2019-04-16/doc-ihvhiqax3241030.shtml>.
- [13] 郑家鲲. 五大理念引领下“十三五”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6, 40(2): 19-24.
- [14] 张红学. 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模式与优化策略的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6, 35(4): 43-47.